

古蜀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

黄剑华*

【内容提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灿烂面貌。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数量众多的青铜造像群和动物造型。它们以丰富多彩的内涵，充分显示了古蜀青铜文化的独特性。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很早就有了民族迁徙，有了古商道与贸易往来。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在殷商中晚期已达到鼎盛，在时间上明显要早于云南的青铜文化。云南的青铜时代大约起始于商代晚期，结束于西汉晚期，器物造型也以人物和动物为主。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南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其考古学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而出土青铜器物最多的是在滇池区域，其年代大约从战国延续至汉代。如果结合民族走廊与文化传播来进行探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蜀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南传，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古蜀文明 滇国遗址 青铜文化 民族走廊 西南丝路

一 古蜀青铜文化的考古发现与主要特点

在中国考古史上和世界考古史上，三星堆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过去我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古蜀族和古蜀

*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王国以前一直被浓郁的神话色彩所笼罩。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古蜀文化灿烂的真实面貌。但三星堆辉煌文明的突然湮没以及湮没后的去向仍是一个很大的谜。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则使我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其以丰富的出土资料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地区的繁荣发展。

可以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从考古学文化方面揭示了灿烂的古蜀文明，是殷商至西周时期长江上游内陆农业文明的重要遗存。它们在文化形态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仅地域相近，在时间上也有相互衔接和延伸的关系，既有共同的文化面貌又有各自的绚丽特色。也可以说古蜀文明是以古蜀族为主体、联盟了西南各部族共同创建的一种地域文明，有着自成体系的鲜明特色，并同周边其他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交流和往来，吸纳了不少外来文化，同时向周边区域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还雄辩地告诉我们，古蜀先民们创造的青铜文明在商周时期发展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展现出绚丽多彩的繁荣情形，完全可以和中原文明以及世界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相媲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不仅为世界考古史增添了亮丽的光彩，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多元一体、多源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以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

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数量的庞大、种类的繁多、文化内涵的丰富，以及其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特色，都是罕见的。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造像群。这些青铜造像群，表达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意识观念和传统习俗，具有强烈而浓郁的象征意义，展现了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夏商周时代的帝王贵族们是用青铜礼器特别是九鼎来象征统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传世文献对此多有记载，考古发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商、周王朝，青铜礼器不仅是王公贵族们和各种礼仪场合（如宴飨之类）中的重要用器，更在频繁举行的祭祀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与中原殷商所处时间大致相同的三星堆古蜀王国，祭祀活动同样盛行，祭祀鬼神与祭祀祖先

同样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内容，但其在祭祀方式以及神权、王权的象征表现方面又与中原有着极大的不同。三星堆也出土有青铜器物，如铜尊和铜罍，但数量很小，这说明古蜀国显然不是依赖和利用青铜礼器来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古代蜀人精心铸造了大量代表大巫（蜀王）和群巫（各部族首领）以及神灵偶像的青铜造像，并赋予这些生动逼真的造像以丰富的象征含义，供奉于宗庙或神庙之中，或陈设于祭台之上，进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显而易见，古蜀国统治阶层所控制的神权与王权正是通过这些青铜人物造像而展现出来，而这也正是古蜀国维护等级制度和有效统治各部族的奥妙所在。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以丰富多彩的内涵，显示了长江上游的蜀文化的独特性：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在社会礼俗与民族心理方面均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青铜人物造像群在三星堆古蜀文化中占据着突出而重要的主导地位，这不仅说明了古代蜀人对人物造像的偏爱，显示了他们特别擅长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古代蜀人对凡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理解，表达了他们清晰明确而又绚丽多彩的崇拜信仰观念。在古代蜀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中，人是万物之灵而神是天地之灵，人主宰生活而神主宰着自然和宇宙，人应该祈福于神灵而获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兴旺繁荣，所以便形成了人神交往的观念以及对人神交往途径的各种想象，青铜造像群便是古蜀人神交往观念的生动体现。

审美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复杂的精神活动之一，它在不同的族群与区域文明之间往往呈现一种多元的绚丽情景。过去通常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崇尚立体雕塑和致力于形体之美的代表，古老的中华文明则以变形的线条艺术和抽象的韵味取胜。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修正了这一看法，说明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在人物立体雕塑方面也有着非同凡响的创造，同时在抽象变形的图像纹饰方面亦展示了非常杰出的造诣。在人物造型方面的高超技艺，正是古蜀青铜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

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古蜀国的农业起源颇早，扬雄《蜀王本

纪》中有“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的说法。^①可知在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已经有了早期农业。到杜宇取代鱼凫成为蜀王的时候，古蜀国的农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虽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开垦种植的农田面积恐怕仍是有限的，并未遍及全境。境内许多地区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林木，由于河流众多和排洪的不畅，境内可能还有大片的沼泽和湿地。这种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自然就成了各种鸟兽栖息繁衍的乐园，也为古代蜀人的渔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中，有很多鸟兽动物的造型，便与古代蜀人的生活环境有关，这也是古蜀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上古以来蜀与滇的地缘关系

蜀与滇地缘相邻，上古以来就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与往来。文献记载，古蜀国第四代蜀王杜宇，就与来自云南朱提（今昭通）的梁氏女利联姻，壮大了力量，从而称雄于西南地区。扬雄《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②扬雄与常璩都记述了杜宇和朱利的联姻，可知这是古蜀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常璩说的南中就是云南，可见望帝杜宇的蜀国疆域是包括了云南很多地方在内的，说明古蜀国的统治与影响已经由朱提扩大到了南中地区。

据《三星堆祭祀坑》综合发掘报告介绍，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海贝 62

① 参见《全汉文》卷 53，（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1 册，中华书局，1958，第 414 页。

② 参见（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第 182 页。

枚,二号坑出土海贝4600枚,其中有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贝等。^①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海贝6880多枚,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和车马坑中也出土有数量不等的海贝,在山东益都县苏埠屯商代晚期墓中也出土有殉贝3990多枚。这些海贝在当时可能已具有原始货币的职能,从数量来看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中原和古蜀都不产贝,这些海贝显然都是由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辗转而来的舶来品,反映了当时的商贸活动区域是相当广阔的。郭沫若先生曾指出,贝朋最早为先民们的颈饰,后来才成为货币,其使用“必始于滨海民族,以其所用之玛瑙贝本系海产。殷周民族之疆域均距海颇远,贝朋之入手当出于实物交易与掳掠。以其为数甚少而不易得,继之以玉,而骨玉均效见形。继进则铸之以铜”。^②有学者认为,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海贝来看,显然是来自异邦。还有学者指出,在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出土有大量海贝和数十支象牙,“它们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来自与中原殷王朝的交往,同时,也不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舶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类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③云南出土的大量海贝,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方国瑜先生指出,西南地区各部族居民,各自成区域地分布,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开通了道路,成为祖国对外交往孔道。“中印两国文化发达甚早,已在远古声闻相通为意中事,最早中、印往还经过西南夷的交通线,各家所说是一致的,至于取道南海及西域,则为汉武帝以后之事。”“故很早时期,楚、蜀商贾在西南地区活动,不乏远走身毒之徒”,从而开通了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④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一书中,通过对《诗经》《楚辞》《庄子》等先秦文献若干名词与楚文化若干问题的研究,认为中印交通的开辟应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初。曾经对西南丝路做过深

①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第150、419页。

② 参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朋》,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第110页。

③ 参见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载《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第43页。

④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中华书局,1987,第7~8页。

入考察的邓廷良先生认为，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齿贝的出现，为藤田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据生物学家考证，那类齿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可见，至少在 3000 年前的殷周之际，印度与蜀之间以可辗转相通，有间接的贸易交换”。^① 西南丝路究竟始于何时，我们从古代文献资料中很难找到明确的记载。通过《史记》和《汉书》中的叙述，可以知道早在通往西域的沙漠丝路开通之前，古商道就已经存在了。显而易见，这条由蜀地通往滇缅的古老商道，在秦汉乃至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后来的西南丝路便是由此而来的。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除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在横断山脉东部边缘地区和滇西的青铜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海贝，制作精美的滇国贮贝器就是专门用来存放海贝的。据统计，在呈贡天子庙、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贮贝器就有 62 件，^② 数量相当可观。这些产于印度洋沿岸地区或中国南海热带海域中的海贝，曾长久被视为贵重物品并作为货币使用，显然都是通过贸易交换而进入古蜀和西南丝路沿线地区的。这些出土的海贝，不仅说明了西南丝路的历史悠久，而且揭示了丝路贸易的兴旺。

我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是著名的半月牙形文化传播带，通常被称为西南民族走廊。其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的原因，与古蜀和氏羌的迁徙活动也大有关系。古蜀和古代氏羌的关系非常密切，都曾栖居于岷江上游，都有石棺葬之俗。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③ 20 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即与古代氏羌和蚕丛氏蜀人有关。石棺葬与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和云南的滇中与滇西北等地也有分布，这种葬俗很显然应来自古蜀和古代氏羌，是沿着民族走廊由北向南迁徙带来的。考古发现表明，石棺葬与大石墓的年代跨度较长，大约从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延续至汉晋时代依然流行，这对我们了解古代

① 参见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 27～28 页。

② 参见张增琪《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第 158 页。

③ 参见（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第 181 页。

民族走廊上的民族迁徙与栖居情形是很有帮助的。与古蜀文化关系密切的四川茂汶地区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发现琉璃珠，经科学测定这些琉璃珠大都不含钡，而我国战国时代自制的琉璃珠制品则属于铅钡玻璃，学者们认为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均是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属于战国时代的 22 号墓中也出土有外来的琉璃珠，在李家山 24 号墓中则出土了来自西亚的蚀花肉红石髓珠。^① 在时间稍晚的云南晋宁石寨山 13 号西汉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根据英国学者培克的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在西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流行时代大致可分三个不同时期，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直至中世纪，在伊拉克和印度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曾发现早期蚀花珠。中期蚀花石髓珠，在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尤其是安息和贵霜时期的犍陀罗遗址中多有出土。我国云南等地出土的这类蚀花石髓珠，显然是通过西南丝路带来的。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中，7 号墓与 13 号墓还分别出土了有翼虎错金镶嵌银带扣、一件鎏金浮雕的狮身人面像铜牌饰，其艺术构思和形象特征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西亚地区的传统作风，显然也是由西南丝路带来的舶来品。有意思的是这种雕镂新奇的银带饰，不一定用于革带，很可能是用于丝带上的。《艺文类聚》卷六十七有“梁刘孝仪谢晋安王赐银装丝带”的记录^②，便是一个绝好的说明。除了我国境内发现的这些由丝路贸易带来的舶来品，在域外也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1936 年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 60 公里处对建于公元前 4 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址进行发掘时，在一处城堡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③ 童恩正先生认为，这些丝绸可能是由蜀地经滇缅先运到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④ 这些都揭示了从三星堆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通过川滇古商道一直和南亚、西亚保持着商贸联系，也由此说明了西南丝路历史的悠久。

① 参见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第 289～292 页；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第 37 页；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0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 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三册，第 1192 页。

③ 参见王治来编《中亚史》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0，第 69 页。

④ 参见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第 5 页。

三 古蜀青铜文化的南传与影响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记述可知，滇国是因为当地有滇池而得名的，滇池区域也就是滇国的主要聚居区。滇国的东部为夜郎国，相比较而言，滇比夜郎还小。从文献记载来看，夜郎有竹王起源等传说，滇国的缘起与滇王的情况则比较模糊。滇国的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有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滇和昆明都是云南古代的主要部落聚居之邦，历史虽久，势力范围却有限，对周边的影响不大，在西南夷地区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受到了中原王朝的注意。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东汉时期的西南夷“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嵩、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① 总体来看，整个西南夷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比较滞后。同巴、蜀、楚相比，滇确实是一个弱小之邦，僻居一隅，地沃人稀，邑聚而耕，很容易遭到强邻的侵入。

从云南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据李昆声先生介绍“根据近半个世纪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为4种类型：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和红河流域地区。”“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在全省70多个市县，共200多个地点，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云南的青铜时代起始于商代晚期，结束于西汉晚期，绵延千余年。^② 考古界大都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南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其考古学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剑川还发现有战国西汉墓葬，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有春秋时期的早期铜鼓。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是在滇池区域，其时代大约从战国延续至汉代。海门口遗址自1957年被发现以后，有几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中期的长期

① 参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第2844页。

② 参见李昆声《云南艺术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51～61页。

被使用的滨水遗址群。该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这里是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可能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大理州境内除海门口外，在几个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的模具石范、陶范等，而代表当地青铜文明辉煌时期的祥云大波那战国铜棺墓，也要早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西汉时代，这些都可以说是与大理地区是古代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地有关。

从考古发现揭示的时代顺序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是最早的，滇西青铜文化的年代也略早，然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呈现由北向南扩散传播的形态。而从中国整体青铜文化发展的格局状况来看，中原华夏地区殷商青铜文化、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在时间上明显要早于云南的青铜文化。如果结合民族走廊与文化传播来做深入探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蜀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南传，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滇文化的出土物中，无论是青铜兵器还是青铜容器与工具，都显示出许多与古蜀文化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说明了古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张增祺先生指出，三星堆二号坑发现有被定名为铜鸡和立鸟的圆雕装饰品，很可能是一种杖头铜饰，此类杖头铜饰在古滇国墓地出土较多，仅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就不下50件，它们因数量较多和所谓的“权杖”无关，而可能是一种扶老用杖。此外三星堆二号坑出土10件玉琮，此类玉器在古滇国墓地出土较多，而三星堆二号坑与滇文化墓葬时代的差距竟有八九百年之多，进而对断代问题提出了疑问。^① 如果从古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分析探讨，是否正说明了这种影响的久远呢？此外，从出土文物看，西南夷之夜郎文化、邛都文化、冉駹文化等也都显示出古蜀文化的某些影响。毫无疑问，古滇国青铜文化接受了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对滇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了。从考古资料看，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物是编钟之类，这在云南很少发现。云南各族最流行的音乐器物是铜鼓，

① 参见张增祺《关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定名、用途及时代问题》，《考古》1999年第4期。

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数量众多，与楚文化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由此可见，楚文化对滇文化虽有影响却并不显著。中原文化的青铜器物在云南也很少发现，同样说明在汉代之之前中原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也不明显。而古蜀文化最典型的青铜器物就是青铜雕像和鸟兽动物形象，这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达到极其娴熟与精美的程度了。云南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最突出的也是人物雕像，许多器物上都雕铸或镌刻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图像，就其活动内容而言，有祭祀、战争、狩猎、纳贡、上仓、纺织、放牧、饲养、炊爨、演奏、舞蹈、媾和等场面，几乎涉及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大量人物活动场面的雕铸，还有不少动物图案的装饰品，约略计之，不同的动物形象达三十八种之多。滇国青铜器注重人物雕像的青铜文化特色，与三星堆青铜雕像可谓一脉相承。从时代沿袭和传播路线来看，三星堆青铜文化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极为昌盛，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商代晚期与商周之际才出现，云南剑川海门口是滇西青铜器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滇西与滇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战国与汉代才逐渐兴旺，很明显地呈现了由北向南发展的态势。从出土的滇国青铜器来看，战国与秦汉时期，滇国的青铜文化最为发达，明显继承了古蜀青铜文化中崇尚人物雕像的传统与特色。

这些真实状况，充分揭示了古蜀青铜文化进入云南后，开始向滇中和滇西的传播路线。这种传播很可能是渐进式的，可能延续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在传播的过程中和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在滇池区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滇国青铜文化。在青铜器和人物雕像的铸造工艺方面，譬如泥范与失蜡法的采用，滇国青铜器也很明显沿袭了三星堆青铜雕像的铸造技术与工艺特色。^①崇尚人物雕像、喜爱鸟兽动物的各种形象，在中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只有四川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和云南滇文化最为典型和突出。譬如四川三星堆出土有众多的铜鸟首、铜牛首、铜鸡、蟾蜍等，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有铜鸟首、金蛙等；这些出土器物与云南李家山、石寨山出土的鸟杖首、铜鼓上的牛、铜鼓上的蛙，在造型上对比，就

① 参见黄剑华《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书社，2002，第294～306页；李昆声《云南艺术史》，第66～67页。

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影响与密切关系。在时间稍晚的滇文化出土器物中，还可以看到来自游牧民族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那应该是秦汉以后才由民族走廊传入云南的，并为滇文化所吸取。

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通过西南民族走廊进行的迁徙活动和文化传播，主要是由北向南的迁徙和传播，相关的文献记载在这方面透露了很多信息，大量的考古资料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殷商时期的古蜀青铜文化已经非常灿烂，对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南夷地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强势的传播与渗透，其实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当时北方的中原青铜文明也非常辉煌与强势，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对遥远的南方地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古蜀国灿烂的青铜文化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与传播，因为地域相邻，又由于民族关系方面的亲缘因素，所以很自然受到了欢迎。这也正是滇文化受到了古蜀文化中青铜造像的强烈影响，也形成了喜爱人物造型青铜文化特色的重要原因。从殷商到汉代在西南地区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滇文化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而古蜀文化则比较强势，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情形。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殷商时期的古蜀青铜文化畅通无阻地传入了滇中和滇西等地。

总而言之，我们从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不仅看到了浓郁的本地民族特色的内容，也看到了周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以后我们对此还可以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而以前对此显然是重视不足的。

（责任编辑 陈 云）